

拜占廷史专家陈志强教授全书审定

帝国的背影 ⊕

拜占廷简史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英] 乔纳森·哈里斯 _ 著 庞国庆 吕丽蓉 陈悦 _ 译
(Jonathan Harris) 陈志强 _ 审校

拜占廷简史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中信出版集团

—
帝国的背影⊕

拜占廷简史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英] 乔纳森·哈里斯 _ 著
(Jonathan Harris)

庞国庆 吕丽蓉 陈悦 _ 译
陈志强 _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拜占廷简史 / (英) 乔纳森·哈里斯著 ; 庞国庆,
吕丽蓉, 陈悦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
ISBN 978-7-5086-8221-1

I. ①拜… II. ①乔… ②庞… ③吕… ④陈… III.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592 号

Copyright © 2015 Jonathan Harri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拜占廷简史

著 者 : [英] 乔纳森·哈里斯
译 者 : 庞国庆 吕丽蓉 陈 悦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 01-2015-7315
书 号 : ISBN 978-7-5086-8221-1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11.5 字 数 : 336 千字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纪念梅布尔 (Mabel, 1896—1966)、
埃塞尔 (Ethel, 1892—1974) 和格雷格 (Grag,
1900—1992)

推荐序

我们眼前的这本《拜占廷简史》(*The Lost World of Byzantium*)是由乔纳森·哈里斯于2015年完成的。哈里斯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历史系教授,还任职于该校希腊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拜占廷帝国中后期历史研究,尤其关注拜占廷帝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拜占廷人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的联系、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灭亡拜占廷帝国后的希腊人流散等问题上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自1993年其处女作《14世纪西欧的希腊难民和移民》问世以后,他几乎年年都有学术成果问世,20多年来可谓著作等身。这位专业拜占廷研究者没有忽视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工作,我们手捧的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读者需知,这本书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读者展卷阅读。这里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有几个不同于其他拜占廷类书籍的特点。

首先,作者的用语通俗化,表述生动,引人入胜,全书很少见到枯燥难读的专业叙述。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在几乎所有拜占廷类书籍中都是正面形象,即便对其出身和显赫世家子弟的说法有些争议,但也不会像此书这样表述。作者借佐西姆斯(Zosimus)之口说“君士坦丁本人是一个私生子,是其父与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一夜情的产物”,其父死后,“士兵迅速宣布年轻的君士坦丁——一个娼妓之子”

为皇帝。至于君士坦丁的性格，作者还是借佐西姆斯之口说，“年过五旬的君士坦丁，身为世上权力最高之人，再无必要隐藏自己‘邪恶的天性’”。笔者推测哈里斯采用这些通俗表达方式，意在贴近读者，扩大读者面。这是将拜占廷古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必要选择，哈里斯这位拜占廷研究专业里手一定是有感于多媒体、自媒体时代人们交流方式的变化而为。放下学者的身段，使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加接地气，哈里斯为众多拜占廷学家树立了榜样。请看他是如何描述拜占廷历史上另一位重要皇帝查士丁尼的，他借同时代作家普罗柯比^①（Procopius）之口说，“查士丁尼是个对臣民福祉漠不关心的饭桶”，在写到皇帝接见隐士萨瓦斯时说，“查士丁尼从其宝座上跃起，脸颊上淌着泪水，跑去拥抱、亲吻萨瓦斯”。其语言形象生动，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介于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表述方式非常符合大众普及作品的需要，描写不僵硬枯燥，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

其次，作者对史料的选择独特，很多描述依据的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结论的信息，正如他在引言中明确宣称的，“本书不可避免地抛弃了其他作者可能论述的内容，也增添了其他作者认为次要，甚至无关的细节”。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原则下，作者独具慧眼地选择了对君士坦丁一世和当局抱有深刻成见的佐西姆斯提供的信息，全书开章明义，引导着读者跟着这位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古代作者步步前行，让读者看到了那个充满邪恶暴力与人性堕落的古代世界，要知道那也许是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样，在对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

① 普罗柯比，拜占廷历史学家，著有《战记》《秘史》等。——编者注

陷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战役的简短描述中，作者给出的几个关键数字就能透露出其史料选择的良苦用心。例如，作者认为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陆地城墙的人数为 8 万，而没有采用 40 万、30 万、20 万之说，是因为他比较倾向于英国学者们的意见，特别是那位赫赫有名的英国拜占廷研究大师仁西曼（后者的史料来自土耳其文献）的说法，后者的分析可能更为合理。在众多记载不同的原始史料中，采用更符合人们思维常理的推测信息，而舍弃夸张的说法，这也是解读古史所必需的。

再次，作者对拜占廷历史与文化持有的基本观点很值得回味。全书最后的“尾声”引语就很有意思。作者引用了巴肯伯爵戴维·斯图尔特·厄斯金（David Stuart Erskine, 1742—1829）的一段话，“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土耳其人毁灭了腐朽的希腊帝国更加幸运的了……”其中既有对拜占廷帝国灭亡幸灾乐祸式的嘲讽揶揄，也有对这个千年帝国全盘否定的批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生活在欧洲启蒙运动中那些笃信理性万能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其中以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最具代表性，因此他的那段名言也被哈里斯引用为第一章引语，“我曾经描绘过野蛮与宗教的胜利”。确实，在反对宗教盲从和专制主义的启蒙时代，拜占廷帝国是欧洲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批评的对象。在经历了 200 多年的史学发展后，人们虽然对拜占廷帝国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启蒙时代给拜占廷研究沉闷气氛带来新鲜空气的振奋感，仍旧是今天读者需要了解的。哈里斯秉持吉本以来的传统认识，让我们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拜占廷学界形成的“一言堂”中看到另一种独特的见解。

我们在这本书中确实看不到被国际拜占廷学界公认的一流学者如奥斯特洛格夫斯基和瓦西列夫对拜占廷帝国灭亡的那种惋惜之情，也看不到近年来拜占廷学界涌现出的那些专家对这个早就逝去的中古文明的“爱恋”，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理性主义是如何解读古代历史的。历史研究可能更需要冷静的观察者，尤其在我们这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通过一本普及读物，让读者在广泛阅读并获取主流观点的同时，更多地了解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观点，不是更好吗？这本拜占廷学界的另类作品一定会令你们眼前一亮，一定会引发你们进一步思考，激发你们开展更广泛深入的阅读。相信你们会在这本书的阅读中做出独立判断，并在掩卷思考中得到更多乐趣。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几位中译者，他们都是拜占廷研究专业人士，都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有的还取得了海外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在翻译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方面都具有深厚的功底。在他们严谨工作的努力下，其中文译本的质量得到了保证，也使审校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在阅读中获得满足感。

陈志强

2017年夏于南开园

序兼致谢

在拜占廷历史上，有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也有一些人与事让笔者久久沉迷于其中。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有了本书的创作。换句话说，本书是笔者探索拜占廷历史长河的一次旅行。笔者重点探寻的问题是：拜占廷帝国在面临不断威胁其生存的动荡和入侵时，为何依然可以延续久远？在最终灭亡时，又为何消失得如此彻底？遵循这一思路，本书不可避免地抛弃了其他作者可能论述的内容，也增添了其他作者认为次要，甚至无关的细节。这一思路也延续到了文末的“延伸阅读”。当然，“延伸阅读”涵盖并不全面，它甚至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观点，而且仅限于大众可以接触到的英文作品，事实上学术界存在大量的相关作品。此外，在涉及拜占廷的人名时，本书试图真实地按照希腊语原文进行转译，但也并没有死板地坚持这一原则。因此，本书中使用了福卡斯（Phokas）、坎塔库镇努斯（Kantakouzenos）、希拉克略（Heraclius）、“生于紫色寝宫的”（Porphyrogennetos）等用法。某些希腊语名字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英文转译，笔者也一律接纳，因此在本书中，君士坦丁（Constantine）替代了康斯坦提努斯（Konstantinos），约翰（John）替代了雅尼斯（Ioannis）。书中的拼写如封面、延伸阅读上的，都是笔者本人的选择。

不管笔者如何将拜占廷帝国视为“遗失的世界”，在实际写作过

程中，仍然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其他学者的深刻影响。近期，两位不知名评论者对本书持认可态度，再加上耶鲁大学出版社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和雷切尔·朗斯代尔（Rachael Lonsdale）的评论，使本书获益匪浅。利兹·霍恩比（Liz Hornby）对书稿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安德鲁·萨金特（Andrew Sargent）从非学术的角度通读了全书，帮助笔者避免了大量的前后矛盾、文法错误、疏忽遗漏等问题。笔者在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学院的工作也对本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笔者没有在“拜占廷帝国及其周边国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课程上试图将观点呈现给本科生的机会，那么也不可能写成本书。学生的反馈、问题、对立观点等，都促使笔者阐释清楚、重新整合观点，甚至有时需要全盘重新思考。笔者还要感谢学院的三位领导：乔纳森·菲利普斯（Jonathan Phillips）、萨拉·安萨里（Sarah Ansari）和贾斯廷·钱皮恩（Justin Champion）。他们对笔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感谢佩内洛普·马伦斯（Penelope Mullens）和玛丽-克里斯蒂娜·奥肯登（Marie-Christine Ockenden）在行政事务方面让一切都进展顺利。最后，能够在如此宏大、多样的学术性学院中书写历史，这是笔者的莫大荣耀。

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2015年1月

引 言

世界上许多地方依然保存着灿烂的古代遗迹，但人们仍然禁不住思索：为何留存下来的如此之少……

——奥吉尔·吉塞林·德·布思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q，
1555—1562 年神圣罗马帝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在 16 世纪中期，奥斯曼苏丹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它的人口迅速增长，超过了 40 万，因而大街小巷一片熙熙攘攘。奥斯曼帝国从克里米亚绵延至阿尔及尔，而首都是这个庞大帝国的中心。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它的官方名称为君士坦丁堡。它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 年在位）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而且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因此这座城市自诩拥有 300 座清真寺，以此来彰显其宗教和世俗的权势。在城市中央的小山丘上，人们正在兴建一座宏伟壮丽的清真寺。按照设计蓝图，它将拥有 4 座尖塔，成为兼有学校、浴室和医院的建筑群。人们将它命名为苏莱曼清真寺，以此来纪念下令修建它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当时宗教界的领袖、伊斯兰世界里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所在地来说，这样一座清真寺是相得益彰的杰作。

1544年，一位叫皮埃尔·吉勒斯（Pierre Gilles）的法国人来到了这座皇都。吉勒斯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是热忱的自然主义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搜寻古代手稿，以便装点位于枫丹白露的皇家图书馆。但最终，他所逗留的时间远超过预期，这是因为弗兰西斯一世在1547年去世，吉勒斯的使命也惨遭遗忘。他发现自己君士坦丁堡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况，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盘缠返回故乡。三年后，为了糊口度日，他不得不成为苏丹军队中的一名雇佣军，并一路向东与波斯人作战。与此同时，在滞留君士坦丁堡的日子里，他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在了解了它的布局结构之后，他对这里渐生亲切之情。然而，激起他兴趣的并非眼下这座城市。他认为，所有宏伟的新清真寺都只会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卑微。他是一位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文人，所以他在寻找这座城市被叫作“拜占廷古城”时的历史遗迹。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古典时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不过吉勒斯很快发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沉迷于这座古城此后数百年的历史，那时，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帝国的首都，而非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同时代的人告诉他，这个不复存在的政治实体被称作拜占廷帝国^①。那时距离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仅仅只有一个世纪，因此吉勒斯看到的古迹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多。于是吉勒斯竭尽所能，迫切地去找寻这个遗失帝国的残存遗迹。他徘徊于城中最明显的拜占廷建筑周围，即从前基督徒的圣索非亚（意为“圣智”）大教堂。这座教堂如今依然矗立

① 当时称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是后来德国学者的创造。——审校者注

于城市中央，正对着苏丹的托普卡帕皇宫。在大教堂外面，吉勒斯不慎滑倒，掉进了沟渠中，意外发现了其中的7根神秘的石柱。有人告诉他，那是拜占廷皇帝的大皇宫的残迹，但他坚信，它们应该是城市中心奥古斯都广场周围的柱廊遗迹。他到街道的地下继续探索。他乘着一只小船，穿梭于地下蓄水池中昏暗的柱廊之间，拱形的屋顶在闪烁的火把中忽隐忽现。他爬到用于标记大竞技场最东端的柱廊上，拜占廷人曾经聚集于大竞技场观看战车比赛。借助于有利地形，他甚至可以看见海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跳跃、戏水。

他发现，发掘拜占廷的过去并非易事。他对古代遗迹抱有太大的热忱，以至引起了当地人的怀疑。城中居住的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一样，也对他怀有敌意。吉勒斯沉迷于测量估算之中，结果被当作间谍告发到当权者处。按照习俗，如果有人受到此种不怀善意的盯梢，摆脱他人恶意的唯一方法是给每个人都送一些酒。参观防御君士坦丁堡西侧的陆墙十分容易实现，因此吉勒斯可以用步子测量出内外防御工事之间的距离。想要参观圣索非亚大教堂则相当困难，因为它此时是圣索非亚清真寺，并不欢迎非穆斯林游客。吉勒斯混在人群之中，从而得偿所愿，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观察了教堂内部高耸的穹顶。为了精准地测量，他只得收买一个土耳其人为他效劳。

吉勒斯对这些古迹极为痴迷，但他仍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过是君士坦丁堡过往辉煌中的一抹余晖。在他阅读的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许多教堂、修道院和皇宫，此时都已经烟消云散。他知道，在靠近陆墙的布拉赫奈曾经存在第二个皇宫，但他无法准确定位。他试图寻找仅次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圣使徒教堂，但无法发现任何蛛丝马

迹，哪怕是地基。他亲眼看到一座古代丰碑被拆卸。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外，他偶然看到从一堆废弃物中伸出一截巨大的黄铜腿。他想去测量，但不敢，因为他害怕引起注意。不过不用测量，他也能目测出这条腿比他还要高。他看似无意地多看了几眼这堆废弃物，发现了一个大约 20 厘米长的鼻子，以及一匹马的腿和蹄子。根据读过的文献，吉勒斯已经准确判断出这是什么文物。他是最后一批亲眼看到这件伟大作品的人之一。这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27—565 年在位）的骑马雕像，它曾经矗立在君士坦丁堡中央广场上的一根高耸石柱上达上千年。皇帝骑坐在腾跃而起的骏马上，右手狂妄地抬起，指向他的敌人，左手则抓着宝球。但此时，他的雕像被堆放在地上，等待着最后的销毁：工匠们已经开始将这些碎片送至铸造厂，准备将其铸造成大炮。吉勒斯总结道，土耳其人一直都仇视雕像，甚至是所有建筑设计和装饰。考虑到这些宏伟建筑背后的含义，此等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全身心地关注着古代遗迹及其规模，对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及其民众并不热心。当他离开时，他发誓再也不会回来。

几年后，吉勒斯在罗马生活，并将自己的经历写入《君士坦丁堡古物》（*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一书。这本书在其死后于 1561 年正式出版。拜占廷帝国曾是如此强大、如此繁盛，却失去了如此多的实物遗存，由此，吉勒斯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拜占廷君士坦丁堡曾经强盛的基督徒统治者是如何失去一切，最终为“异教徒”所奴役的？他总结道，这只是那个世界特定地区的气候所造成的性格问题：

出于这个原因，尽管君士坦丁堡看似由政府建成，但它的民众既没有受教的行为礼仪，也没有严格的纪律准则。他们的富裕导致他们懒散懈怠……并且在面对从四面八方将其包围的蛮族时，完全没有抵抗力。

吉勒斯显然不是第一个将拜占廷的灭亡归因于懒惰和道德放纵的人，当然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大约两个世纪后，爱德华·吉本再次涉猎这一主题。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他强调了“希腊人”的“懦弱和内耗”，和许多人一样，他更愿意称拜占廷人为“希腊人”。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观点认为，拜占廷人存在某些缺失，导致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当需要装备军团去击败无数的敌人时，他们却忽视政治和经济现实，转而重视礼拜仪式、尚古情怀、教义争端和教堂装饰。正因如此，在现代人看来，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和学校课堂中，拜占廷帝国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又表明拜占廷帝国不应该如此轻易就解体了：如果拜占廷民众真的是如此懒散、凄惨以致无力抵御外敌，那么为何他们的社会能够延续如此长久？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些转瞬即逝的强权势力，比如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匈奴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他们依靠强大的军事征服建立了强大的王国，但随着缔造者去世，王国分崩离析。拜占廷帝国以 330 年君士坦丁堡的落成为起点，以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为终点，

其历史长达 1 000 多年。考虑到拜占廷帝国多次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幸免于难，这一纪录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类不断迁徙，逃离压迫或者躲避自然灾害，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或者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去征服、掠夺。有些时候，这种迁徙会在某种程度上减缓。公元前 31—公元 180 年，罗马帝国正是受益于这样的形势，才得以保全宽广的边界，从未在多处同时受到侵犯。拜占廷帝国在很多方面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却没有如此幸运。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处于亚洲诸平原、阿拉伯半岛上各部族向西迁徙的冲击末端。

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拜占廷帝国的发展脉络和命运。它独特的社会和精神正是为了应对边境地区巨大而频繁的压力而形成的。在面对外敌侵犯时，单纯的军事威力不足以完全应对。拜占廷帝国在战场上击败了一方，可能又会出现几个新的入侵者。于是帝国内出现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寻求消除威胁的方法，如整合定居、贿赂收买，其中最非凡的方式是：建立视觉上的巨大冲击来震慑敌人，进而将他们变成朋友和盟邦。拜占廷帝国经常遭遇灾难，却依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幸存下来并实现复兴。如果拜占廷文明中的这些层面没有得到完全的呈现，那么拜占廷人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难辞其咎。在他们的文献、艺术和礼仪中，他们成功缔造了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他们把展现出来的社会定位为对过去的绝对的延续。正因如此，直到帝国灭亡，他们依然坚持将自己描述为“罗马人”，似乎从古代起一切都未曾变化。但在现实中，面对无穷无尽的威胁，拜占廷在不断地进化和适应。基于此，现代人很容易接纳拜占廷人自己所呈现出来的情景，而

忽略了拜占廷社会的准确本质。所以，吉勒斯、吉本以及其他所有探寻拜占廷消亡原因的人都问错了问题。真正的问题并非它为何走向灭亡，而是它在面对压倒性的外部势力时，为何总是能够幸存下来，甚至一度更加繁盛壮大。